

大都市边缘区乡村遗产价值认知与保育

——以上海市青浦区为例

The Value Recognition and Conservation of Rural Heritage in the Fringe of Metropolis: A Case Study of Qingpu District in Shanghai

顿明明 曹洁

DUN Mingming; CAO Jie

摘 要 本文对大都市边缘区的乡村遗产价值定义进行思辨，试图为乡村的“去留”选择提供一个判断视角和思考维度，并以上海市青浦区为例，提出了乡村遗产价值的保育策略。文章认为乡村遗产是活态遗产，特别是对于大都市边缘区而言，其乡村遗产价值判断要以未来遗产价值发展的可能性为前提，从多个维度对其进行评估和识别，并对遗产价值发展的连续性进行保育。

关键词 大都市边缘区，活态遗产，乡村遗产价值

Abstract This paper reconsiders the definition of rural heritage value in the fringe of the metropolis and then tries to provide a perspective for the rural areas. Taking Qingpu District in Shanghai as an example, it proposes a conservation strategy of rural heritage value. It is believed that rural heritage is a living heritage. The evalu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the rural heritage value in the fringe of the metropolitan area should be based on the subsequent heritage value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and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heritage value should be conserved.

Keywords the fringe of the metropolis, living heritage, rural heritage value

- 中图分类号: TU984
- 文献标识码: A
- DOI: 10.12049/j.urp.201801007
- 文章编号: 2096-3025 (2018) 01-0050-09

作者信息

- 顿明明 苏州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讲师
曹洁 上海思纳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董事，高级工程师

伴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深入，由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社会经济问题日益凸显。在践行新型城镇化战略的背景下，城乡关系须从“二元”向“一元”转型已经成为各界的共识，乡村地区的未来发展越来越受到各方的关注。我国乡村的类型多样，不仅具有显著的地域特征，地区发展的条件也各不相同。特别需要关注的是，在城镇建设区与非建设区相互交错的大都市边缘地带，乡村面临更大的生存与发展挑战。

本文关注的是位于大都市边缘区、具有一定自然地貌景观特色或历史文化风貌特征的乡村聚落。笔者在对其“遗产价值”进行辨析、认知及思考的基础上，

以上海市青浦区为例,提出乡村遗产价值的维系策略。在大都市“增量拓展”或“减量平衡”的需求压力下,笔者希望通过此文为大都市乡村的“去留”问题提供一个判断的维度和选择的视角,为乡村遗产资源保护维系提供参考建议。

1 大都市边缘区乡村的特征与发展挑战

1.1 大都市边缘区

“大都市”通常用来描述那些在特定区域内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方面具有较高影响力,并发挥着重要政治、经济、文化功能的大城市^[1]。一般认为,大都市的人口规模不少于200万。结合我国城市规模等级划分和城市区域影响力分析,笔者认为,我国的“大都市”可以指人口规模达到5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大都市边缘区”通常是指城乡用地相互包含、互有飞地和犬牙交错的地域^[2]。从定量研究的角度看,弗里德曼等曾根据人们日常的通勤范围,将城市周围大约50km的区域划分为城市边缘区,其中内边缘区大约为10—15km,外边缘区延伸到25—50km^[3]。

大都市边缘区距离中心城区较近,交通便利,一般是城市扩张的首选区域,是土地形态和结构变化较快的区域,具有不稳定性^[4]。同时,大都市的劳动力需求对农业人口具有“虹吸作用”,中、青年劳动人口进入大城

市或周边城镇从事非农产业活动,使得大都市边缘乡村地区比远郊地区呈现出更明显的人口空心化和老龄化趋势^[5]。此外,大都市边缘区也成为外来务工人员低成本生活的地区,社会结构呈现出动态变化的特征^[6]。因此,大都市边缘区被认为是城镇化进程中最活跃的地带,也是最敏感的地区。

以上海为例,在新一轮《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20—2040)》中,城市发展的远景目标是成为卓越的全球城市。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上海大都市由核心向边缘不断快速扩张。相关研究表明,城市边缘区距中心区的距离逐年递增,“由1988年的12km,发展至1997年的20km,再到2009年的30km。因此,城市边缘区涉及的行政区也由城市中心区、近郊范围逐渐延伸到松江、嘉定、青浦等城市远郊的范围”^[4]。近年来,伴随着远郊新城的建设以及产业空间的转移,上海大都市边缘区的界线进一步向外扩展。

1.2 大都市边缘区的乡村危机

乡村是相对城镇而言,具有完整性、地域性的生活及生产聚落,居民以农业为经济活动的基本内容。乡村聚落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内生性特征,它通过与自然环境的紧密结合,形成适宜的人居环境;同时,乡村聚落的社会组织由较强的血缘和地缘关系构成,是归属感强烈的熟人社会;此外,人与土地的紧密联系以及对自然环境

的高度依赖,使乡村的生产、生活空间合为一体。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乡村具有自然内生性、社会领域性和功能复合性特征。

更为重要的是,乡村“自然与人居环境的和谐关系,构成了每个地区最具特色的地域景观和文化特质,不仅是中华文化的宝贵财富,更是每个地区城镇化进程中需要保护的重要资源……不同地区乡村之间的差异远大于城镇间的差异”^[7]。可见,乡村地区与城镇地区在形态、空间、文化及生产、生活方式等方面存在着众多的差异性。同时,不同地域间的乡村类型十分多样,乡村是体现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

我国大都市地区经历了快速的城镇化过程,位于其边缘的乡村地区事实上已经处于“半城镇化”状态。乡村所具有的自然内生性、社会领域性和功能复合性特征都已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城乡统筹发展战略在边缘区具有不同的内涵和敏感性。值得关注的是,对于大都市边缘区而言,一个重大挑战是,大都市的拓展和蔓延正不断吞噬和同化孕育了自身的“母体”地区,地域乡村文化的“基因”正在消失。然而,“乡村地区在保护传统文化、地域文化和中华生物多样性方面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和紧迫性,是保护地方文化和传统文化的最后防线”^[7]。

笔者认为对大都市边缘区乡村遗产价值的发掘和维系具有重要的意义。其原因在于,乡村是大都市发展

的历史原点，其“遗产价值”是文化之根，同时也是都市乡愁记忆的“留存地”。

2 乡村遗产价值认知与解析

2.1 乡村遗产价值辨析

在1972年颁布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中，“文化遗产”定义^①所强调的“突出的普遍价值”即为稀缺、不可替代的“遗产价值”^[8]，使文化遗产成为被保护对象具有法律上的合法性。早在1964年发布的《威尼斯宪章》中就已提出：保护对象包括“能够从中找出一种独特的文明、一种有意义的发展或一个历史见证的城市或乡村环境”。乡村所具有的“遗产价值”使一批古村落及乡土建筑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如我国的皖南古村落（西递、宏村）、福建土楼等。

在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中，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是重要的遗产类型。《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2008）》中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城市、镇、村庄，可以申报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1）保存文物特别丰富；（2）历史建筑集中成片；（3）保留着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4）历史上曾经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或者军事

要地，或者发生过重要历史事件，或者其传统产业、历史上建设的重大工程对本地区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或者能够集中反映本地区建筑的文化特色、民族特色。”

我国的法定文件对乡村遗产价值判定的表述与历史文化名城、名镇的判定标准是相同的，主要是以建成环境特色和历史文化意义为维度进行评判，缺少结合乡村与城镇的不同特征进行差异化界定的操作。但事实上，乡村遗产价值构成不仅仅包括建成环境和历史文化方面，其内生于自然环境的本质特征，使得生态环境及地域景观成为其不可或缺的价值组成。同时，具有地方特色的民俗活动也是乡村遗产的重要内容，其活动的区域成为重要的文化空间，也是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之一。

笔者认为，对乡村遗产价值的认知应结合乡村自身的特征进行判别，仅仅针对乡村聚落的建成环境进行研究，难以全面地定义其遗产价值的内涵。因此，对乡村遗产价值的认知还应考虑三个方面的关系，即乡村与自然的关系、乡村与城市的关系以及乡村生产与生活的关系。

首先，乡村与自然生态环境具有紧密的共生关系。与城市相比，乡村聚落规模小，布局分散，建筑密度低，

对自然环境高度依赖。可以说，乡村聚落是自然中的人文景观，自然地景是乡村意象的标识。乡村是自然与人文景观的共生体，对遗产价值的认知需要关注自然环境的特征。

其次，乡村与城市建设区具有平衡的依存关系。在城镇化过程中，城乡间的空间关系是动态变化的过程，乡村空间从远郊到近郊，甚至发展成为“城中村”。乡村与城市如同硬币的两面，各自依赖对方而存在。乡村是城市人“乡愁记忆”的承载地，城市为乡村提供“现代化”的驱动力。换言之，乡村对城市而言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对乡村遗产价值的解析应包括其与城市间的依存关系及其对城市特殊的历史文化所产生的意义。

最后，乡村的生产与生活之间具有完整的互动关系。每一个村落都是完整的生产生活单元，具有内生的互动性。最明显的体现是家庭作坊式的生产、生活的结合，更有一些乡村公共空间与农业生产、民俗文化等相结合。因此，生产生活单元的整体性价值应体现在乡村遗产价值中。

2.2 大都市边缘区乡村遗产价值退化

大都市规模的不断扩张，郊区城镇的“借势”成长，区位特征使大都市边缘区的乡村面临更大的空间竞争

① 文化遗产是指“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建筑物、碑雕和碑画、具有考古性质成分或结构、铭文、窟洞以及联合体；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在建筑式样、分布均匀或与环境景色结合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单立或连接的建筑群；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联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地方”。

压力。

首先,乡村的自然生态基底环境发生变化。在大都市强力拓展的趋势下,一方面边缘区不断扩大,农田和林带面积减少,自然基底结构蜕变;另一方面,人口和产业功能从中心城区外迁,其重新布局和选址改变了原有的生态系统。其次,乡村趋于人口空心化,留守人口老龄化。与其他地区的乡村相比,边缘区乡村的人口外流具有更便利的交通条件,大都市的产业发展吸纳了大量的边缘区乡村人口进城务工,留守的多为老人和儿童。最后,乡村传统风貌特色退化。一方面,人去楼空,传统建筑由于长期无人居住而破败^[5];另一方面,人口的流动性和结构的不稳定性使乡村建设失去了村规民俗的文化约束,进而使乡村丧失了地方特色,与大都市的景观风貌趋同,“千村一貌”的“异化”趋势明显^[9]。

换言之,城镇化带来的文化同质性现象在大都市边缘区的乡村体现得尤为明显,如在已公布的第七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目录中,位于大都市行政范围内的乡村数量占比较小。

2.3 上海市青浦区乡村遗产价值解析

2.3.1 研究背景和意义

青浦区地处上海市西南部,太湖

下游,黄浦江上游。地形上,东西两翼宽阔,中心区域狭长,地势平坦。区内江河纵横交错,湖泊星罗棋布,内河航运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青浦历史悠久,早在几千年前就已有先民居住,并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崧泽文化”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具有一定典型性代表的原始社会文化,由此断定,青浦地区是上海迄今为止被发现的人类最早的聚居地^①。青浦区在上海国际大都市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地位。

上海市政府在城乡统筹发展的战略背景下,提出推进上海市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总体要求,全面梳理和评价乡村在生活、生产,文化旅游以及风貌景观方面的价值,加强乡村规划的编制工作,整体推进村庄的保护和利用,分批推动农村转型升级。青浦区政府落实市政府的要求,对区内的村落进行调查与研究,目标是遴选出具有一定遗产价值的乡村,在推进“合村并点”工作时予以保留,并通过相关程序将其列入保护村名录^②。但通过普查遴选和重点调查研究两个阶段的工作,发现作为上海大都市边缘区的青浦区乡村聚落,其建成环境的风貌特征多数已经发生蜕变,其中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章堰村在历史风貌的整体性方面离历史文化名村的要

求仍然有较大的差距。可以说,如果依据现行法律法规中关于乡村遗产价值的评价标准,可列入保护名单的乡村寥寥无几。

同时可以看到,青浦区具有湖、河、港、田、林等要素构成的自然生态格局;崧泽古文化遗址、福泉山古文化遗址、青龙寺塔等历史文化遗存对上海城市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朱家角镇、练塘镇等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已经成为江南古镇文化和红色文化的代表。因此,笔者认为,对青浦区乡村遗产价值的辨析和判断应该从区域特征和活态遗产的视角进行思考,研判乡村与自然的关系、乡村与城市的关系以及乡村生产与生活的关系。这要求我们不仅要关注乡村现存的遗产特征,更要关注乡村历史文化对城市的意义以及乡村遗产价值动态发展的可能性。只有通过系统、客观的研究,才能为上海大都市边缘区乡村的“去留”提供一个判断的维度。

2.3.2 区域基底分析

据统计青浦区的土地总面积为668.52km²,约占上海市陆域总面积的10%。已建设用地为207.48km²,占全区总面积的31.04%。青浦区的城镇建设用地多集中在中部和东北部,南部和西北部以农业用地为主。从青

① 资料来源于上海市青浦区政府网站 http://www.shqp.gov.cn/gb/special/node_8989.htm。

② 上海市青浦区政府委托上海思纳建筑与规划设计有限公司编制《上海市青浦区农村风貌要素梳理与保护村选点规划》,其成果作为本文案例研究的资料来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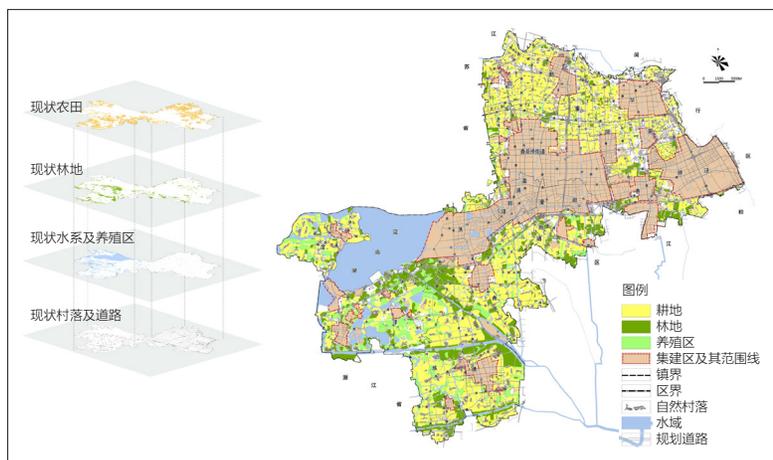


图1 青浦区土地资源特征分析

Fig.1 The analysis on land resources of Qingpu District in Shanghai

资料来源:《上海市青浦区农村风貌要素梳理与保护村选点规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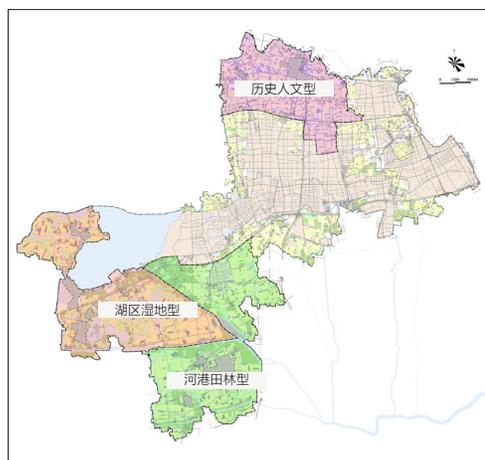


图2 青浦区自然与文化基底特色分区图

Fig.2 The diagram of featured partitions based on landscape in Qingpu District

资料来源:《上海市青浦区农村风貌要素梳理与保护村选点规划》

浦区的土地利用规划和集中建设区布局来看,以沪青平高速公路为轴,淀山湖以西地区基本上与上海中心城区连绵成片,北部还保留着一定范围的农村地区,呈现出明显的边缘区特征。淀山湖南部和东部地区以农业生产用地和村镇建设用地为主,保留了原有的河流水系和池塘、湖泊,生态基底保存较好(图1)。可见,在青浦区的东部和西部城镇化和非城镇化地区呈现出明显的“图底反转”特征,乡村地区由于区位差异,与中心城区的距离不同,基底环境呈现出“一区两貌”的特点。

2.3.3 乡村遗产价值解析

在对青浦区的自然环境和历史文化进行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前文对乡村遗产价值的认知和思考,笔者认为,

可以从自然文化基底、生产生活单元、聚落格局风貌以及民风民俗活动等方面对乡村遗产进行价值解析。

(1) 自然文化基底

对青浦区的自然环境特征和历史文化遗存的分布进行梳理和分析,提炼出对乡村聚落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影响的要素,划定能反映基底特征的景观环境特色分区,从乡村的孕育环境来认知其遗产价值的构成。根据青浦区地域环境要素构成的不同特点,研究将青西与青北乡村集中的区域划分为三类特色区:湖区湿地型、河港田林型、历史人文型(表1、图2)。

(2) 生产生活单元

长三角区域以前都是冲积平原,由海潮冲击形成。当地村民最早在土地上围出一个土圩子进行开垦,这样

形成的空间形态被称为“圩”。圩区是圈圩筑堤、抵御洪水、从事农业生产的地区,也是乡村地区生产、生活一体化的单元。一般而言,完整的圩区由堤、宅、田、塘四个要素构成,它们共同构成乡村独特的景观(图3)。

通过对《青浦区水利规划(2013—2020年)》中的圩区规划与《青浦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年)》中的城市集建区规划进行叠合分析,可以看到,未来将保留的圩区范围主要是太浦河北、新谊河以南的区域。通过对圩区现状的调查研究,对其特征要素进行分析总结,研究确定了对乡村遗产价值有意义的圩区选择的原则:具有一定的规模;具有景观良好的进入路径;有青浦地区独有的地域风貌要素(堤、田、林、村、塘、河);其中的乡村聚落格局和肌

理较为完整；具有独特的乡村生产、生活记忆场景。最后，我们建议保护、保留 12 个圩区，成为乡村遗产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图 4）。

（3）聚落格局风貌与民风民俗活动

在对自然环境基底和生产生活单元展开分析的基础上，研究初步遴选出 26 个乡村，在对其聚落格局风貌及民风民俗活动方面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后，进一步明确其遗产价值。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研判，首先，是否具有较为完整的聚落格局风貌。这一点主要从乡村的总体形态格局、建筑肌理风貌、公共空间景观等方面进行评价；其次，是否具有有一定数量的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名木古树等历史文化遗存，以及独特的民俗民风活动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后，是否还留有典型的乡村意象的记忆场景，如能够承载乡愁记忆的场所，能够代表乡村风貌特色的典型场景等（图 5）。

2.3.4 遴选结果与类型归纳

通过对 26 个初选村落的分析评价，最终确定 19 个建议保留的村落（图 6、表 2）。结合青浦区乡村整体的环境特色以及对每个村的详细调查研究，归纳总结出三类具有不同遗产价值特征的乡村：传统风貌型，代表了一定时期内乡村地域的建筑风貌特色；历史遗存型，聚落范围内的历史文化遗存成为其遗产价值重要的构成

表 1 青浦区自然文化基底特色分区

Tab.1 Featured partitions based on landscape in Qingpu District

特色分区类型	范围界定	核心特征
湖区湿地型	主要是太浦河以北，淀山湖周边区域。该区域湖荡众多，水网发达，仍保留着“水乡泽国”的地貌特征，是青浦区最具地域代表性的乡村区域。	湖区湿地型农村风貌区位于淀山湖沿岸，水网密布，河湖众多，具有独特的淀山湖景观。用地构成中，水域面积所占比例最高，达 30%，圩区保护和利用充分，具有青浦区最早的湿地湖荡地貌特色。具体而言，首先淀山湖历史悠久；其次，这里是上海最具水乡特色的区域之一；最后，这里是乡村地区中的圩区保护最完好、利用最充分的区域之一。
河港田林型	主要是太浦河以南，由太浦河、大蒸港及泖河围合而成的区域。该区域河流、农田和林地都比较丰富，是长三角地区一般性乡村区域。	首先是河港围合。太浦河、西泖河、大蒸港三条河港把风貌区围合，水利交通方便，同时，区域内的小河水系也十分丰富，贯穿整个风貌区，形成特色水乡；其次是林地覆盖率高。在各类风貌要素中，林地占比最高，为 26%，林地的高覆盖率使整个风貌区充满了多氧的气息，形成了乡村林地的特色风貌；最后是农田用地与水系融合。整个风貌区由于水系纵横，十分有利于农田的灌溉种植和农作物的繁衍生长，两者相互映衬，形成了田园风貌。
历史人文型	主要是吴淞江以南，青北农村的集中区域。该区域的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文物古迹众多，是青浦区最具历史文化代表性的乡村区域。	首先，吴淞江作为上海发展的源头之一，是承载历史变迁的河流，在数千年的乡土风貌演变中，历经了各个时期的乡村发展变化，对本区域乡村风貌的塑造具有特殊的意义；其次，区域内的青龙古镇是上海留存下来历史最悠久的古镇之一，遗迹众多。作为上海第一的古镇，曾经是最繁华的小镇——青龙古镇，从一片沼泽经过数千年形成河流、农田、村庄、小镇。同时区域内的各种历史文物无不述说着风貌区的历史人文故事；最后，它是青浦区农田最多的区域。整个风貌区内农田占比达 39%，通过科技手段基本形成了特色现代农业，展现了风貌区的乡土农业文化。

资料来源：笔者参考《上海市青浦区农村风貌要素梳理与保护村选点规划》绘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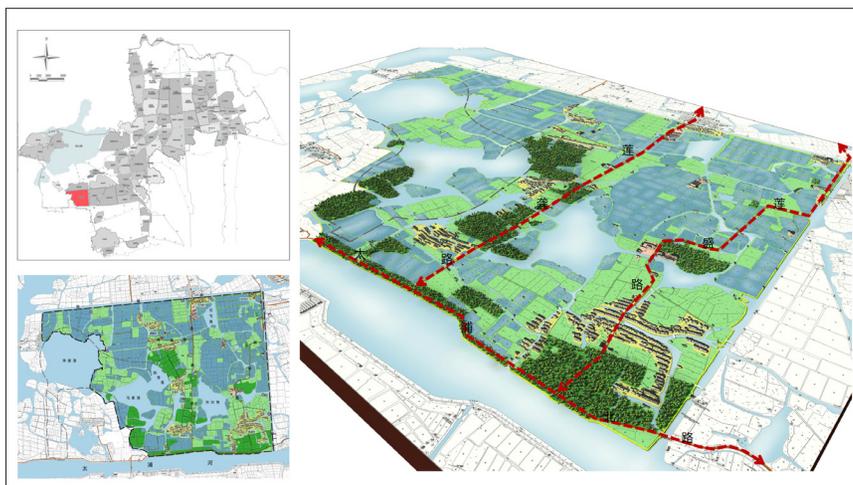


图 3 青浦区圩区特色要素分析图

Fig.3 The analysis on characteristic elements of the polder in Qingpu District

资料来源：《上海市青浦区农村风貌要素梳理与保护村选点规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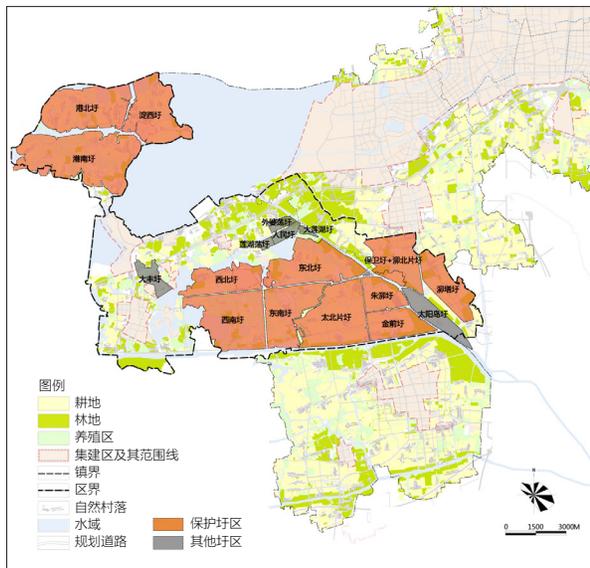


图4 青浦区建议保护圩区分布图
Fig.4 The distribution of proposed polder conservation areas in Qingpu District
资料来源：《上海市青浦区农村风貌要素梳理与保护村选点规划》



图5 青浦区章堰村典型乡村意象分析图
Fig.5 Typical countryside style of Zhangyan Village in Qingpu District
资料来源：《上海市青浦区农村风貌要素梳理与保护村选点规划》

部分；乡土景观型，乡村聚落与其环境共同构成了最具地域特色的景观。

3 乡村遗产价值维育策略

3.1 不断发展的乡村遗产价值

从遗产价值的维度对乡村进行研究，目的是深度挖掘乡村存在的意义。特别是对大都市边缘区而言，在外延式快速扩张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前瞻性的研判，具有“遗产价值”的乡村要么成为“合村并点”的拆迁对象，要么成为“城中村”，进而与原本紧密相关的自然环境失去联系，最终变成更新改造的对象，如深圳市罗湖区的湖贝古村。

通过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到，对于

乡村而言，其遗产价值具有更广泛的内容，地域自然生态与景观特征、生产生活方式与环境特征、民风民俗活动与风貌特征等都构成了其重要的内容。事实上，大都市边缘区的这些乡村遗产价值在城镇化过程中不断地发展变化，具有活态性特征。可以说，与相对偏远地区的传统村落相比，大都市边缘区的乡村遗产价值的发展更加不稳定，也更加脆弱。

3.2 “保护”还是“维育”

从上海市青浦区乡村遗产价值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到，19个建议保留村落的遗产价值与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名录的标准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以法定文化遗产为目标的保护具有其

特定的含义，以管理手段去控制、引导乡村风貌的变化，如果措施不当也会导致“遗产价值”的异化。同时，大都市边缘区的人口空心化现象严重，严格的管控会导致乡村社区的活力进一步衰退。

笔者认为，结合大都市边缘区的乡村遗产价值具有的活态性、不完整性的特征，应首先采取保留措施；其次重点对与乡村聚落紧密相关的环境进行维护和控制，提升乡村生活的环境品质，保存社区人口的数量和活力；最后通过乡村地区与城市的良性互动发展，不断丰富乡村遗产价值的内容。因此，对乡村遗产价值而言，活态维育社区活力比静态保护建成环境更有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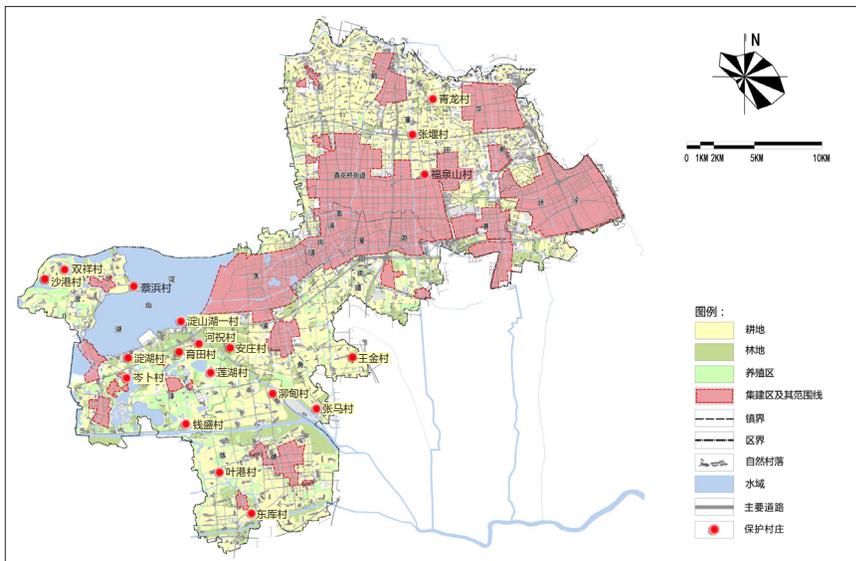


图6 青浦区建议保留村分布图
Fig.6 The distribution of proposed conservation villages in Qingpu District
资料来源:《上海市青浦区农村风貌要素梳理与保护村选点规划》

3.3 青浦区乡村遗产价值保育策略

从19个建议保留村落的分布来看,它们都位于已划定的集中建设区外。但在青东地区的青龙、章堰和福泉,由于距离集中建设区非常近,如果集建区进一步拓展,它们有可能成为“城中村”。结合前文的分析,研究建议从三个方面对19个建议保留村落的遗产价值进行保育,完善和丰富其遗产价值内容。

首先,严格控制集建区范围,在划定的城市开发边界的基础上,青浦区可以划定农村地区具有自然生态和景观特色的保护区,以保护乡村价值保育的外部环境。例如结合前文结论,划定三个乡村自然环境景观控制区,同时进一步明确需要保护的圩区,避

免由于集建区的扩张而使这些村落成为“城中村”。

其次,青浦区在实施“美丽乡村”行动的过程中,对建议保留的19个村制定针对性的措施,避免因乡村美化而导致其遗产价值异化。通过调查研究,我们发现,在“美丽乡村”建设的过程中,有些工程措施使乡村的本质特征弱化,“美丽乡村”建设成为另一种城市美化运动。例如道路铺装硬化、建设与城市同质化的广场空间、河流岸线人工化、景观环境公园化等。乡村遗产价值源于其与城市不同的本质特征,遗产价值保育是乡村真正美丽的内在基础。

最后,青浦区乡村遗产价值保育要重视社区营造。乡村以地缘和血缘

表2 建议保留的村落类型

Tab.2 Types of proposed conservation villages

类型	建议保留的村落
传统风貌型	泖甸村、章堰村
历史遗存型	青龙村、福泉山村
乡土景观型	淀峰村 & 淀山湖一村、双祥村、蔡浜村、岑卜村、钱盛村、河祝村、莲湖村、育田村、淀湖村、沙港村、叶港村、东库村、张马村、王金村、安庄村

资料来源:笔者参考《上海市青浦区农村风貌要素梳理与保护村选点规划》绘制

为基础的稳定的社会结构使其具有很强的社区感,但大都市的吸引力使人口外流,导致乡村的社区感弱化。青浦区乡村可以利用靠近大都市中心区的区位优势,结合自然和文化资源,发展具有特色的农业旅游、电子商务等产业,吸引年轻人回村创业,维系乡村社区的活力,进而保育、活化其遗产价值。

4 结语

在2013年12月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但对于大都市区的居民而言,到离家不远的地方追寻乡愁似乎慢慢变成一种奢望。在2016年7月举行的“拯救”深圳湖贝古村的“对话湖贝”论坛上,著名文化遗产保护专家阮仪三教授呼吁留下深圳城市发展的“历史原点”——湖贝村,并指出“没有‘乡’,还谈什么‘乡愁’”。

正如前文分析,乡村遗产价值认

知须考虑多方面的因素，特别是对于大都市边缘区而言，仅从乡村建成环境进行遗产价值评估，最后的结果可能是可保留、可保护的村落数量很少，从而使都市人“乡愁”难觅。本文试图阐述一种观点，即乡村遗产是活态遗产，其遗产价值是伴随着城乡互动发展过程不断发展和丰富的，遗产价值动态、连续性保护的意义要大于对静态建成环境的保护。因此，对乡村遗产价值的认知要以未来遗产价值发展的可能性为前提，重点是对孕育了乡村的自然环境，与乡村发展良性互动的城乡关系，乡村生产、生活系统

的完整性和活力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丰富性进行评估，进而选择具有可维系遗产价值的乡村进行保留，使其成为都市人“乡愁”的承载地，未来也是乡村文化旅游的重要资源。 **URP**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易承志. 大都市与大都市区概念辨析 [J]. 城市问题, 2014(3):90-95.
- [2] 张娜, 宁越敏. 上海城市边缘区扩展与大都市空间结构演变 [J]. 中国城市研究 (电子期刊), 2010, 5(1):49-58.
- [3] 张晓军. 国外城市边缘区研究发展的回顾及启示 [J]. 国外城市规划, 2005(4):72-75.

- [4] 吴娟. 上海城市边缘区的特征研究 [J]. 上海城市规划, 2013(1):93-99.
- [5] 古颖, 张泽. 基于乡村文化的大城市郊区美丽乡村规划对策探索——以上海市青浦区章埭村为例 [D]// 城乡治理与规划改革——2014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4:1633-1642.
- [6] 李世峰. 北京城市边缘区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对策 [J]. 经济师, 2006(2):272-273.
- [7] 张尚武. 城镇化与规划体系转型——基于乡村视角的认知 [J]. 城市规划学刊, 2013(6):19-25.
- [8] 顿明明, 赵民. 论城乡文化遗产保护的权力关系及制度建设 [J]. 城市规划学刊, 2012(6):14-22.
- [9] 贺勇, 孙佩文, 柴舟跃. 基于“产、村、景”一体化的乡村规划实践 [J]. 城市规划, 2012(10):58-62+92.

上接 39 页

术指引》，以及广东省农村沼气的有关标准、新技术、新材料的应用，尽快解决农厕改造、村庄绿化、特色民居修缮、农村清洁能源开发利用等民生问题，打造低碳、健康的人居环境。 **URP**

鸣谢

感谢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张翔、肖红娟、曾健勇为本文提供素材。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赵之枫. 城市化加速时期村庄集聚及规划建设研究 [D]. 北京: 清华大学, 2001.
- [2] 王冠贤, 朱倩琼. 广州市村庄规划编制与实施的实践、问题及建议 [J]. 规划师, 2012, 28(5):81-85.
- [3] 李淑玲. 增城村庄规划建设管理研究 [D]. 广州: 华南理工大学,

- 2015:32-37.
- [4] 谢晓林. 新农村村庄规划建设政策实践探讨——以广东省广州市为例 [J]. 小城镇建设, 2007(10):84-87.
- [5] 陶德凯, 彭阳, 杨纯顺, 等. 城乡统筹背景下新农村规划工作思考——以南京市高淳县薛城村第九自然村村庄建设规划为例 [J]. 规划师, 2010, 26(3):50-54.
- [6] 李伟, 徐建刚, 陈浩, 等. 基于政府与村民双向需求的乡村规划探索——以安徽省当涂县龙山村美好乡村规划为例 [J]. 现代城市研究, 2014(4):16-23.
- [7] 孙秀峰, 屠泳博, 陆元晶. 灾后重建背景下的村庄建设规划方法探析——以绵竹市遵道镇棚花村四组村庄建设规划为例 [J]. 城市规划, 2009, 3(4):73-76.
- [8] 曹春华. 关于我国村庄规划法治化建设问题的思考 [J]. 现代法学, 2013, 35(2):108-115.
- [9] 刘宇红, 梅耀林, 陈翀.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村庄规划方法研究——以江苏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规划实践为例 [J]. 城市规划, 2008, 32(10):75-79.
- [10] 王纪武, 张念思. 基于公共政策视角的村庄规划与建设研究——以珠海市为例 [J]. 西部人居环境学刊, 2016, 31(1):50-55.